

孫中山先生與臺灣及其歷史遺產

壹、前言

二十一世紀一開始，在臺灣政治史上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動：政黨輪替，靠全民直選的結果決定由誰來執政。民國97年，孫中山先生創建的國民黨再靠選舉贏回執政權。這種民主政治的實踐，不能不使人緬懷孫中山先生，他以自由、平等、博愛，粉碎了千年帝制，改變天經地義的王朝歷史，開創新的國家體制，然後才有二十一世紀開始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平和的政權交替與發展。回顧歷史，中山先生雖然只短暫到過臺灣三次，但顯然中山先生的歷史遺產確實留在臺灣，而且發揚光大。

要了解中山先生與臺灣的關係，不妨從三方面入手：第一、中山先生三次來臺的史實及其革命活動帶給臺灣什麼衝擊？第二、1920年代臺灣人心目中的孫中山形象如何？第三、中山先生逝世後留給臺灣的歷史遺產又是什

麼？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貫穿其中的臺灣政治運動與社會思潮發展，正展現了中山先生的主張與其所主導的國民革命運動對近代臺灣政治變遷的複雜影響。

貳、孫中山先生三次來臺灣的史實

1894年，中日第一次戰爭，清廷戰敗，臺灣被迫割讓。當時丘逢甲寫下了離臺詩：「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這首家喻戶曉的七絕。同一時期，中山先生組成近代中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正式啟動了革命運動。甲午戰爭的失敗，臺灣割給日本，暴露清廷的積弱，激起民族主義在臺灣的狂潮，也對中山先生主導的革命勢力，起了催化作用。民國34年(1945)，中日第二次戰爭因中國勝利而收回臺灣，「六百萬民同快樂，壺漿箪食表歡迎」。然而不旋踵，中山先生建立的中華民國政府即因國共分裂而播遷臺北，臺灣與國民革命的歷史因緣，堪稱特殊而曲折，中國大陸的政治情勢，直接間接的與臺灣政局發生互動。

依據資料，孫中山先生一生至少到過臺灣三次。1900年9月，中山先生首次來臺灣。這一年，中國發生庚子拳亂，引發八國聯軍之禍，中山先生利用情勢，策劃惠州起義，這時中山先生抱著從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獲得援助的希望。同時早在1897年秋，陳少白就已來臺建立興中會臺灣分會，結合了楊心如、吳文秀、趙滿朝、容祺年等同志，基本上已有了革命組織的基礎。加上臺灣地近中國大陸，與廈門一水之隔，接濟和內渡均稱方便。便航向臺灣，以臺灣作為策劃第二次起義的基地。

1900年9月28日，中山先生從神戶經馬關到基隆，旋進駐臺北，指揮部設在新起町（今長沙街、中華路一帶），住在臺北聞人李春生的小洋樓。10月8日，鄭士良奉孫命起義於惠州三洲田，並以進取廈門為目標。10月中旬，從鎮隆出師後，等待臺灣的軍械支援，即可揮軍指向廈門。但因兒玉食言，軍械接濟之事落空，第二次起義宣告失敗，中山先生遂於11月10日乘橫濱輪赴日。他的這次來臺，停留時間最久，總共42天，在近代革命史上，極具意

義。

民國元年2月清帝退位後，中山先生辭讓大總統，並舉袁世凱以自代，不意袁缺乏政治遠見，失信於民，刺殺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又違法向五國銀行團借款，意圖破壞政黨政治。民國2年7月，國民黨人忍無可忍，發動討袁的二次革命，但因勢力懸殊，國民黨人在江西、南京、上海的主力先後失敗，中山先生只好偕同胡漢民等人離開上海，經過福州，搭日輪信濃丸到臺灣再轉赴日本。這是中山先生第二次來臺灣，下榻臺北御成町的梅屋敷，即今中山北路國父史蹟紀念館。據梅屋敷主人大和宗吉的弟弟藤井悟一郎的回憶，孫先生著黑色西服，不多言語，食量不多也不嗜酒，隨行除有日人保護外，臺灣總督府也派憲兵在門口警戒，似是禮貌接待，也不無監視意味。儘管如此，孫還是見過了興中會老同志楊心如、當年割臺時北部抗日軍首領陳秋菊等人。中山先生這次在臺停留時間短暫，也沒有太多的活動，8月9日就到日本神戶。

民國2年到5年中，孫中山先生在海外奔走，目的是討

伐袁世凱。民國5年6月，袁世凱病死，軍閥割據，迫使中山先生於6年8月南下進行護法事業，7年4月遭地方軍閥的杯葛，桂系陸榮廷與政學會首領岑春煊等，改軍政府為總裁制，明白排斥中山先生的領導地位，中山先生乃辭護法軍政府大元帥職。5月21日發表辭職通電後，偕胡漢民、戴季陶等，乘大阪商輪蘇州丸離粵，經汕頭、臺北赴日，一行於6月初到臺北。這是孫中山第三次來臺。

關於中山先生這次來臺，唯一且也是最可靠的紀錄是隨行的戴季陶在民國16年2月，於廣州中山大學對臺灣革命青年團的講詞中提到：民國7年中山先生離開廣東，經過臺灣去日本時，很想與臺灣同胞見面，發表意見、宣傳主義，喚起民眾的意識，鼓吹愛國的精神，但因日本殖民政府的阻撓而未能實現。

戴季陶指陳日本殖民政府阻隔臺胞與中山先生的接觸，也害怕日本開化派有識之士對臺灣人啟迪新思想，換言之，日本政府害怕臺灣人與中國民眾的聯繫，會導致殖民統治的崩潰。戴季陶說：「臺灣的民眾則是我們中國的

民眾，臺灣民眾的團結就是我們民眾的力量。臺灣民眾愛祖國的熱忱，則是我們民眾革命精神的發揮。」

同一篇演講中，戴季陶又特別提到中山先生逝世前，兩人一起討論日本問題時：中山先生特別指出，在當時情勢下，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且要使臺灣與高麗兩民族，在最少限度得能自治的實現。當時國民黨正採取聯俄容共政策，致力於國民革命運動之際，中山先生把日據下的臺灣與韓國（高麗）等同看待，要求日本最起碼要給予高度自治，這是可以理解的想法。中山先生主張臺胞爭取臺灣自治政府的策略，是當時中國有識之士如梁啟超等人共同的想法，他們的看法自然也影響當時臺民政治運動的走向。

叁、孫中山先生在臺灣人心目中的形象

1905年，中山先生主導下的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東京成立。1910年就讀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翁俊明與同學蔣渭水、杜聰明等，在學校成立「同盟會臺灣通訊處」，呼應

中山先生倒滿的號召。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知識分子，他們對中山先生的認識，一是來自傳統的漢民族意識，一是來自辛亥革命的成功。據當時就讀臺灣醫學校的杜聰明回憶：

民國初年前後，筆者是在醫學校之學生時代，我們臺灣青年雖受日本統治下，但我們漢民族的意識很旺盛，每朝起床就閱讀報紙看中國革命如何進展，歡喜革命成功。我們醫學校學生及國語學校學生有志相聯繫，秘密集會。記憶一次星期日在艋舺平樂遊料理店，數次往和尚洲柑園內聚會，討論時局的變化，及募款寄往國內作革命資金之一部份，醫學校學生中最熱心者蔣渭水、翁俊明、蘇樵山、曾慶福及筆者等。國語學校有李根盛。又當時國內自福州有同級生王兆培，自漳州有後級生陳春輝在學，國內事情比較清楚，留學生我們很歡喜聽他們的報告革命成功的經過。

辛亥革命成功，在臺灣即使是傳統文人，也對中山先生深致讚賞，出身霧峰林家的林癡仙，民國元年作〈孫逸

仙〉詩三首，說孫「掃盡五千年帝政，佇看黃種人出頭」，又說「早重民權唱自由」、「共和新國耀寰球」。

對臺灣青年而言，辛亥前中國受滿清之害，臺灣則受日本異族統治，在漢民族意識下，有血濃於水、聲氣相通的感受。辛亥革命之後，在中國，民族主義初步達成，進而求國際地位的提升，以及國內政治的革新；在臺灣，民族運動或寄望於中國革命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或自求多福，不論激烈或溫和的反日抗爭，似乎仍有賴於「民國革命元勳」、「弱小民族救主」—孫中山的帶領。

有兩個例子可說明臺灣青年針對海峽兩岸政治社會命運進行了思索。孫中山讓位袁世凱後，袁走向獨裁專制的野心逐漸暴露，具有血氣之勇的臺灣知識青年深感憤恨，亟欲除之而後快。眾議推派臺北醫學校翁俊明與杜聰明二人北上刺袁，專攻細菌學的杜聰明建議，培養霍亂菌投入自來水源頭可以「毒死」袁世凱。民國2年8月，杜、翁二人攜帶三瓶霍亂菌由基隆經日本轉大連，再經山海關入北京。在北京盤桓多日，屢探形勢，發現袁氏府邸門禁

森嚴，無法潛入，只好廢然而返。杜聰明後來回憶說「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的確非常幼稚，但也表現了年輕人的志氣，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當時臺灣青年痛恨帝制，傾慕民國的強烈心理，並不因受異族統治而稍減。」民國5年，杜在大阪加入中山先生領導的中華革命黨。

同一年，臺灣發生了苗栗事件。主要人物是羅福星。羅福星，17歲（1903年）隨祖父來臺，住苗栗牛欄湖（造橋），1907年加入同盟會，一度去南洋，1911年參加三二九廣州之役受傷脫險。民國元年返臺，以苗栗為根據地，聚合孫中山信徒發展抗日組織，民國2年12月，事洩被捕，被株連者有一千兩百人之多。民國3年3月受絞刑，臨刑前作〈祝我民國詞〉，把「中華民國孫逸仙救」八個字嵌於字首。日本殖民政府所編印的《臺灣警察沿革誌》說明苗栗事件的根源：「（臺灣民族）革命運動，全部是在支那革命與支那軍政要人保持密切連繫下進行的，所以其思想的傾向，乃至其背景都是站在三民主義，尤其是民族主義立場上的。」

其後，許多在臺灣或是臺籍的先烈先賢，像大力捐輸協助三二九之役板橋林家的林薇閣、熱心參加中山先生的護法事業，且是臺灣同胞恢復中華民國國籍第一人的霧峰林家林祖密。他們都是以畢生心血，毀家紓難的支持中山先生救國建國的理想。

中山先生在生前雖曾三次來臺，但因奔走革命，或因殖民政府的嚴密監視，很難與一般臺灣民眾打成一片。不過，透過媒體的介紹與傳播，臺灣知識分子對他其實是有相當深刻的印象，這只要看他逝世前後臺灣同胞的關切與悼念即可得知。

日據時期比較能代表臺民喉舌的報刊是民國12年4月在東京發行的《臺灣民報》，這一「被殖民者的發聲工具」，後來移回臺灣發行，以淺近平易的中文，刊載生活智識，並以啟發臺島文化、掀起同胞元氣為宗旨。1920年代該報不斷出現有關中山先生行蹤、言論的報導，其中最能呈現對中山先生人格觀感的是他逝世前後的報導。民國13年11月，孫應段祺瑞、馮玉祥之約北上，12月初經日抵津，身

體已感不適，入京後病情加重。次年1月，數度傳出死訊，後均證明不確。民國14年2月21日及3月1日出版的《臺灣民報》，出現充滿感情的文字，訴說「孫中山先生之死不確」，和「孫文沒有死」的闢謠消息。文中指稱：孫而果真死，是中國的不幸，東洋的不幸，更是全世界的損失！孫的死果然是謠傳，那實該為中國四萬萬國民慶祝，更為東亞的大局、世界的前途慶祝，「弱小民族萬歲！萬歲！」這是臺民以「弱小民族」發出的呼聲。

民國14年3月12日，中山先生逝世，一群就讀北京大學的臺灣學生，立即以「北大臺灣學生會」的名義，致送一幅豪情悲切的輓聯：

三百萬臺灣剛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領導？

四十年祖國未竟事業，舍我輩其誰分擔！

當時就讀北大的洪炎秋回憶，1920年代三民主義思想瀰漫北方學界，臺灣留學生紛紛加入國民黨；同一時期就讀日本明治大學的郭國基在日本入黨，而上海大學的臺灣學生，政治上列屬左派的翁澤生，3月13日親赴莫利愛路

弔孫之後，寫了一篇〈哀悼中山先生〉，發表在4月11日出版的《臺灣民報》上，稱孫是「平民的導師」、「革命的領袖」、「國民的國父」。

孫中山確定過世的消息3月13日傳到臺灣，《臺灣民報》於次日寫成、4月1日正式發表的社論：〈哭望天涯弔偉人一唉！孫先生死矣！〉，一開頭便說：「夢嗎？真嗎？3月13日的電文說孫中山先生死！可是這次似乎真的死了！想此刻四萬萬的國民正在哀悼痛哭罷！西望中原，我們也禁不住淚泉怒湧了！一封電報就能叫我們如此哀慟，這都為了什麼？」因為他是「自由的化身」，是「熱血的男兒」、是「正義的權化」，他「推覆滿清，引率國民，馳驅於革命而爭自由」，他高揭打倒軍閥、反對帝國主義，「真是替弱小民族吐了無限的抑憤！」他「眼中只有三民主義，只有正義，……四十年間統為正義、為主義而戰。」這位「自由正義的戰士」雖死，「而三民主義是還活著，自由正義永遠不死的，他的熱血還熱騰騰的湧著，而且永遠湧著！泰山頂上的鐘聲停了，但餘響還嘹亮著。酣睡著

了人們也漸漸地醒起來了！」《臺灣民報》同一期，由張我軍執筆的〈常使英雄淚滿襟〉一文，追念孫中山，稱他為「弱小民族之父」、「自由正義之聲」。

孫中山先生在臺胞心目中的偉人形象，似乎還可從他過世後不論左派、右派臺灣同胞的紀念活動中看得出來。民國14年3月24日，臺灣文化協會主辦，以「臺灣有志社」之名，實際還包括臺灣文運革新會、臺灣青年讀書會等團體聯合在臺北舉行追悼會。當天，大雨滂沱，容納三千人的會場，來了五千人，但無人退場，足見臺民對孫的熱誠。這次追悼會值得記述的事有二：第一、當日大會由王敏川主講中山先生事蹟，後由主持人施至善講述此會之來由，稱「孫公乃東亞之偉人、漢民族之明星，其主義與人格，無論何人莫不尊敬而崇拜之。」張一郎演講孫中山先生的主張，謂孫以不屈不撓精神建造中華民國；復倡亞洲聯盟主義以固東亞黃人，孫之死，是中國之不幸，亦東亞黃人之不幸。均把孫中山之地位提高到國家之上。第二、這場追悼會受到日本殖民政府刻意限制和干涉。當日會場禁唱

悼歌、不准演講，張我軍的弔詞，涉及臺灣島人悲戚及反對帝國主義欺凌的字眼，均被要求刪去，最後連弔詞也不得朗誦。日本軍警刻意要切斷臺灣與大陸的聯繫，強迫臺民遺忘原有的歷史，重新塑造新的歷史與記憶，用心十分顯著的。為此，作為臺灣三百五十萬人喉舌的《臺灣民報》，在同時即提出抗議文—〈臺灣人不該哭孫先生的死嗎？〉這篇文章更是道盡當年中山先生在臺灣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

嗚呼！中山先生逝世矣！民國的元勳！漢民族的領袖、東亞的大明星、世界的大偉人，這是孫先生可獨享的榮譽。孫先生四十年的革命生活，建設共和創造民國，其對主義的忠實，一貫的精神就可為世上政治家龜鑑。而且孫先生不獨為一個民國的革命家，他的對東亞的親善和世界的平和也非常努力了。又且對弱小民族的解放也非常盡力了。所以孫先生可稱謂民國革命的元勳，世界的平和神，弱小民族的救主了。所以這回孫先生的訃音傳出，中外之人莫不神慟心傷，

爭吊〔弔〕偉人於千古。

在臺北的諸有志，追慕先生的功德，於3月24日夜開追悼大會，吊大偉人之英靈，追悼偉人一事，何等尋常，而這回的追悼會開會前，又有一番的干涉，什麼吊歌不可唱，吊辭要檢閱，唉！熱淚是悲傷之極由心內流出的，那禁得住淚灑滿襟呢？唉，一偉人的死，我們臺灣人不該放聲大哭？怎麼也不該吞聲滴數點的悲傷淚嗎？

民國18年6月，南京舉行中山先生奉安大典，臺灣民眾不顧日人干涉，指派謝春木、王德麟代表致敬。日據初期，臺灣的知識分子對中山先生的印象或許並不深刻，但幾十年後，孫先生作為時代開創者的歷史形象，顯然已深烙在臺灣知識界中。臺灣在日本的統治下，日、中、臺的關係特別敏感又複雜，中山先生給臺民什麼樣的啟發呢？也許「臺灣的魯迅」、「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當年給孫先生的輓詞，可以提供一個答案：

當四萬萬同胞，酣醉在大同和平的夢境中，生息在專

制忘我的傳統道德下，嬉戲在豆剖瓜分的危懼裏，使我們曉得有種族國家，明白到有自己他人，這不就是先生呼喊的影響麼？

先生的精神久嵌入在四萬萬人各個兒的腦中。使這天宇崩、地軸壞、海橫流、山爆烈、永劫重歸，萬有毀絕，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空間，永遠永遠的不滅。

在這樣的氣氛下，臺灣青年例如翁俊明、李友邦等，毅然赴大陸投入國民革命的行列，是可以想像的事。

肆、孫中山先生留給臺灣的歷史遺產

民國94年8月21日，中國國民黨在臺北召開十七屆中央評議會第一次會議，黨主席馬英九先生提到，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先生到臺灣，臺北人廖進平募了六萬元給孫，當時孫中山先生身無長物，便將隨身攜帶的威士忌酒送廖，這瓶酒後來成為廖家傳家寶。廖進平曾是民國16年蔣渭水領導的臺灣民眾黨的宣傳部長，是三民主義的信仰者，不料在民國36年的二二八事件中失蹤。民國94年二

二八受害家屬座談會中，廖進平的哲嗣廖德雄先生把傳家寶的「國父酒」送給了當時還是黨副主席的馬英九。這則故事可以有深一層歷史的思考：自晚清、1920年代、戰後以來，中山先生留在臺灣的，實有極為深厚的感情、共同記憶和歷史遺產。

孫中山先生的晚年，從歐戰後的世界思潮裏，汲取民族自決與民主主義主張，豐富了他的民族、民權主義內涵；從十月革命後的俄國，學習到組黨的方法與理念，也使他的民生主義更具時代意義。不論是中山先生生前或死後，這些都使得在日據下臺灣島內或海外的知識分子，直接間接的、或多或少的受到感染和影響。1920年代開始所謂的「臺灣民族運動」，以臺灣為主體，或中臺聯手對抗日本帝國主義，實衍生出相當複雜的臺灣政治與文化民族主義。如果說在1920年代初期，林獻堂領導的臺灣文化協會及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臺人受民族自決思潮影響，為爭取參政權，「謀臺灣文化之向上」，要求自治的非暴力政治文化訴求，這多少是受梁啟超、戴季陶等人的啟

發有以致之。另有一股力量在中國大陸遙相呼應，上海、廣州、北京、南京等地求學的臺灣青年，受到中山先生扶助弱小民族主張的影響，或投入國民革命行列，或自立團體進行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舉例來說，孫中山先生逝世後，民國16年初，張深切、張月澄、郭德欽等人在廣州成立的「臺灣革命青年團」，樹立革命旗幟、向日本殖民者公開宣戰，宣言書是這麼寫的：共產主義是西方怪物，三民主義是東方偉物，「三民主義的偉力，足使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心寒膽顫，由於據此而奮鬥的中國民族革命發展而愈加強了世界弱小民族的勢力。同時，我孫中山先生的精神與三民主義也越顯出它的偉大。……他雖然已經逝世了，但是他的偉大精神仍繼續指導著東方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顯然，孫中山先生領導中國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壯舉，的確給了被殖民的臺灣人很大的鼓舞。

1920年代臺灣的殖民社會的確催發了臺灣民族運動，但也埋下分裂的種子。這一時期臺灣知識分子開始研讀孫中山全集，欽慕中山先生思想行動。臺灣應自日本人

手中解放出來，變成多數知識分子的共識，但用什麼樣的革命手段則有不同看法。民國15年8月，《臺灣民報》開始出現本土的陳逢源與留俄的許乃昌有關中國革命性質的論爭，論戰維持五個月之久。雙方都拿中山先生的思想為論據，可見其影響之深。這一場論戰導致了民國16年初臺灣文化協會的分裂，形成三派別、兩團體：左派以連溫卿為首，講求階級鬥爭；介於左右之間的蔣渭水被視為折中派；蔡培火主張現狀妥協下的民族自保，被看作極右派。在團體上「文協」變為左派，以連溫卿、許乃昌為主幹；民國16年年7月成立的「臺灣民眾黨」，由蔣渭水主導，在林獻堂、蔡培火「臺灣地方自治聯盟」還沒成立前（1930）均屬於這個系統，被視為右派團體。蔣渭水被稱為「臺灣的孫中山」，顯示這時期蔣的想法和臺灣民眾黨的主張，最具中山先生歷史遺產的象徵意味。

蔣渭水，臺灣宜蘭人，曾「以中華民族作日本國民的臺灣人」自況。民國15年，蔣渭水在臺北創辦文化書局，以介紹中國名著並專辦「勞働問題農民問題諸書」為務，

廣告中推出的書單，包含了水滸、三國、儒林、新詩、新女性雜誌之外，有更多的孫中山民生主義、建國方略、孫逸仙傳記、寫真、相片，及日文社會主義相關新書，不啻為當時臺灣新文化的櫥窗。這時期蔣渭水讀了中山先生的許多著作，對孫先生的政治主張和革命經驗多所體會，對國民黨推動的國民革命更有其個人獨到的見解。他在《臺灣民報》一連發表40篇〈中國國民黨之歷史〉，盱衡民國16年後臺灣政治的變局，認定左傾的階級鬥爭方法，在臺灣現狀是不可行，而中山先生民國13年之後革命策略，國民黨民國15年的北伐，民國17年的統一過程，則頗值得臺灣政治運動作為借鏡與參考。蔣渭水後來的政治運動多汲取孫中山的政治遺產，確實是日據時期典型的臺灣「孫文主義者」。

民國34年日本戰敗，臺灣歸還中華民國，很多臺灣家有藏書的知識分子，將蒙塵已久的孫中山著作拿出來好好展讀，就像黃得時的敘述，「以前我只知道三民主義是民族、民權、民生，但並不知道內容究竟是講什麼事情。現

在我花了整整三天的功夫，把這兩本書（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從頭到尾，細心閱讀，使我深感國父確是一位繼往開來、頂天立地的大思想家。……」沒有藏書的人，則如傲岸的臺灣作家楊逵說的：大家趕著印，搶著去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歷史的許多發展，往往出人意表，民國38年國、共的慘烈內戰，迫使中山先生建立的黨和政府播遷臺灣，堅持中華民國正統，與矢志繼承中山先生遺志。半個多世紀來，這種以孫中山崇拜為中心的政治體制，跟著臺灣本土勢力的挑戰而發展。八〇年代民主化後，民國89年，國民黨喪失了政權，民國97年，又贏得選舉，重新執政。表面上看來，這是孫中山建立的黨一次重大挫折，但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孫中山建國的終極目標是要走西方的政黨和議會政治，政黨輪替何嘗不是中山先生民主政治理念與主張的具體實現，正可以說明孫中山的歷史遺產留在臺灣有其重大的意義與價值。

伍、結論

孫中山先生是具全球視野的時代人物，討論他與臺灣的關係，不能將生前、死後簡單地切開觀察，也不能光看他踐履斯土的行動而不注意他思想層面的印記。

孫中山先生曾三次到臺灣。第一次來臺，把臺北當作惠州起義的革命基地，第二、三次來臺，都是在革命事業遭受頓挫之時。他對臺灣既有深情，又寄厚望；他矢志革命雖在甲午之前，但清廷割臺之舉，「棄臺民即散天下」，確實加深中山先生顛覆清廷之志。孫終有生之年，自知無力解決臺灣問題，但在臨終之前還惦記著日據下臺民的政治走向。日據時代臺灣在殖民政府管控下，訊息的來源不多，但提及「漢民族領袖」的孫中山先生，一般人民多肅然起敬，知識分子就更見其印象的深刻，只要看民國14年孫先生逝世時《臺灣民報》所刊出不分左派、右派文字中，以「國民之父」、「東亞大明星」來尊崇，以及之後每年熱烈舉辦孫先生紀念會（直到民國18年被禁），即可深深感受。

中山先生出身農家，卻能成就不平凡的事業，自有其人格的特質。與孫先生交往深切的吳稚暉未見面時認為他屬江洋大盜，既見面後說他具有「自然的偉大」。研究中山先生生平的西方學者，如韋慕庭（C. Martin Wilbur）、史扶鄰（Harold. Z. Schiffrin）盛稱孫先生為「永不灰心的革命家」、「世界公民」。其實早在1905年革命黨人陳天華已認定中山先生「彼之理想、彼之抱負，非徒注眼於本族止也，欲於全球之政界上、社會上開一新紀元，放一大異彩」的「世界大人物」。更具體的說：中山先生一生以「天下為公」為理念，有權也不謀私，淡泊自持，簡單樸素，人所共知。他是一個學者兼政治家型的人物，民初時人已認定「具有革命思想而又能實行革命規畫者，舍孫文以外，殆不多見也。」更重要的是他還具有恢宏的氣度、開闊的眼界、寬廣的思路。當一般人注意局部時，他往往能看到全體；別人忙於現實時，他能回溯過去、展望未來；他所看到的，不只是一個人、一件事或一小區域，而是一大群人、整個中國、大亞洲、全世界。在個人特質上，中

山先生是一位自強自信、樂觀進取的人，有強烈使命感；膽略過人，故能藐視困難，勇於承擔風險；他不沉緬過去，但又能勇於接受教訓和經驗，順應時潮，面向未來。在日本治下的臺灣知識分子對孫先生感受深刻，原因或不難從其人格特質中求得一二。

最後，要明確指出，孫中山先生是改變中國歷史格局的大人物。早在1895年3月與日本駐港領事的交談中，他已明確提出中國革命是以成立共和國、選舉總統為目標。他希望中國走議會政治、政黨政治的路線和信念，終其一生未曾改變。經過100年後，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終於步上民主政治的坦途，這是孫中山先生理想的實現，中華民國的確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理念的繼承者。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民主化成就，應是今天紀念孫先生146歲誕辰的最佳獻禮。